■叶倾城

最好的敬重

第一次意识到“老师亦凡人”，我才初中。

学校里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地理老师，他年轻，朝气蓬勃；他俊美，笑起来的时候像拨云见日；他热心地理，自费订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这简直是惊人的行为；他全心扑在教学上，每一节课都像脱口秀，他又唱又跳又演示又讲解，誓要把地理知识全刻在我们脑子里。

这简直是《放牛班的春天》《蒙娜丽莎的微笑》《死神诗社》……里才应该有的热血老师，带动着一群半死不活的学生，走向新世界。

但很可惜，老师遇到的，是中国高考。我们全都知道地理是副科，成绩稍好的同学都会去理科，永远不再碰地理的边，即使学文科的同学，也不过觉得这是“背背背”的东西。有人觉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人小小年纪已经在背托福单词，有人在组时髦的文学社……反正，就是没人理会他。他是火焰，我们全是不锈钢，冷冰冰的，没有冒出任何一支火苗。

有一天上午第四节课是地理，还差十几分钟，后排男生躁动起来，开始敲饭盆，那意思是：赶紧放我们去吃饭吧。

年轻的地理老师一皱眉，假装威严地说：“想提前下课去食堂的同学就去吧。”

他以为这句话能震住男生，不料他话音未了，呼啦啦，居然真的站起来好些同学，拿着饭盆出去了——他们都学习优异，班主任不会批评他们的。

地理老师完全被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

我个子小，总坐第一排，此刻就在他眼皮底下，与他几乎脸对脸。我一抬头，恰好看见他扭过脸去，满眼泪。

——老师也会哭？

当时十三四岁的我，惊呆了。

到现在，再来看当年的地理老师：他就是个孩子呀。初出茅庐，怀揣着改造社会的理想，他从来没想过会被社会改造。他以为将心比心，只要他真诚地对待这门学科、对待学生，一定会收获同样的真心——哪里有这么容易。

那一刻的不知所措，是他被生活第一次毒打吗？

现在，地理老师只怕快退休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也无从知晓他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老油条，抑或，他还保存了曾经的稚气与热情。

我的年纪已经渐渐超过平均寿命的中位数，当年那些被我幻想过、好奇过、畏惧过的职位，比如：外交官、主持人、警察、市长、省长……都剥去了云山雾罩的幻影，露出了普通人的本来面目。我听过他们的心事，原谅过他们的软弱，与他们合作过……不过如此。

凡人皆不可被神化。

而“老师”，往往是一生中第一个被神化的职业。

想想看，从做小宝宝开始，就有这样一个人，告诉我们的，都是对的，都是必须要完成的。谁能不怕老师？哪怕老师从来没打过没骂过，没有像妈妈那样劈头盖脸，但——他（她）是老师呀，光这一条，就足以让人言听计从。

有那么多好词好句是赞美老师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有多少人，一看到蜡烛就想到老师。无私奉献，谆谆教导，严师出高徒，良药苦口……都是形容老师的。

有没有人想过，这种赞美的背后，其实是剥夺了老师作为人的一面，只呈现了他作为“师”的一面。认为老师的价值体现在于对学生的理解与爱，必须要对学生有情感关怀。在这样的职业要求下，人们假设着老师在教书之外，应当付出不求报酬的情感劳动，其中包括，在行为上，成为学生学习的典范；在思想上，引导学生向主流价值观靠拢；在性格上，要坚定平和……

但其实，老师也就是人呀。

有些老师爱打游戏；

有些老师会在世纪佳缘上征婚；

有些老师脾气不好，多半按捺，偶尔失控；

有些老师能教育好几千几万的学生，就是教不了家里那一个……

老师会因为学生的成长而欣喜，但这欣喜里可能有私心杂念；老师会为了学生的落后而叹气，但叹气久了便已麻木。教书只是一份职业，如果你的父母不会在他的职业上付出一切，也不必这样要求老师。

想通这一点，也许师生的相处会平和一些。

有些学生怨恨老师：为什么他偏心成绩好的学生？

实话实说，是人就有偏心。老师的错不在于偏心，而在于流露出来——但老师不是职业演员，演技不到位是很正常的。只要他在偏心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公平，就无可指责。

有些学生“爱”上了老师，百度“师生吧”里，有无数吐露的心声。

这其实也是一种神化，作为中学生，你的老师可能是你见过最知识广博的人。但你是有可能上大学的，有可能去那些有院士的大学，还可能负笈海外，到时候再来看？

师生一场，是难得的缘分，无论三年五载还是一个学期，都是一生几乎不可重来的相聚，是值得以敬重之心，好好对待的。

作为学生，对老师最好的敬重就是：

学清楚那门他（她）教的课。

■游宇明

鱼高不高兴是鱼的事

王憨山先生是中国当代杰出的花鸟画家之一，他的画作磅礴大气，不阿流俗、独辟蹊径。然而，王憨山一生在画事上用力极多，却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据他的好朋友贺安民介绍：晚年的王憨山声名初露，去长沙参加一个美术笔会，与一位声名显赫的省内画家同排作画。人在艺术上都是“喜新厌旧”的，大家对那位画家的小写意花鸟画平时看得比较多，对王憨山这位新出道的大写意花鸟画家则充满好奇，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他。王憨山自然非常开心，越画越起劲，一连画了两幅，观众一片叫好，电视台的摄像师也将镜头长时间地对准他，完全忘记了在他旁边画画的另一位。那位画家很不高兴，收拾画具提前退场。

从此事即可看出，王憨山确实有几分憨气，他忠厚、努力，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城府，不懂得如何迎合他人。他的“憨”是天趣，一些人想学都学不来。

某些人的“憨”则是被迫的。有个朋友，在书法上很有些名气，获过全国性的奖项，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周围一些人将他当成花瓶，聊天、喝茶喊他，唱歌、跳舞约他，开始他怕别人觉得他傲慢，每请必到，弄得自己很累，书法上也无多少长进。后来，他定了一个规矩，不是特别重要的社会活动一定拒绝。这自然也引起了一些闲话，但朋友全然不顾。

认真想来，一个人真正想干点事，必须有几分憨气。所谓憨气，就是将精力集中于自己想抵达的目标，不顾及世俗的眼光，不在乎他人的评价。

人不是钱，不会所有的人都喜欢。鱼生活在水里，龙也生活在水里，但龙有时会在天上飞腾一会儿，这些飞腾可能带来鱼的不适，让鱼不高兴，因为鱼一辈子只能生活在水里，但龙的本性就有想飞的一面，鱼高不高兴是鱼的事，而非龙的事。如果一条龙为了鱼的心情放弃飞翔于九天，龙就不再是龙，而是一尾普通的鱼。换句话说就是，周围的某些人可以自己当鱼，却不可以妨碍你去做龙，妨碍了不是你的错，而是别人的错。

以前有句话，叫人到七十古来稀，如今人的寿命长了，活到八十来岁不是大问题，但一个人能够做事的时间依然极其有限。我们从几岁到二十多岁，是学习时间，社会不会要求我们创造什么。二十多岁以后到六十岁退休，是真正干事的时候，但这短短的三十多年，晚上睡觉占去了三分之一，吃饭、应酬、旅行、赡老养幼得花费相当的时间，能够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间还有多少呢？工作跟爱好一致还好说，要是不一致，我们用来种植自己所好的时间更是少得可怜。如果这一点点时间，你还要瞻前顾后，还要看别人的脸色是晴是雨，还要进一步退半步，就很难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

让生活多点“憨气”，最需要的是担当。一个人怕事，别人咳嗽一声都觉得是对自己的极大不满，可能是对自己实施报复的开始，你就不可能有心思去干想干的事。相反，我们将世事看开了，认识到不侵害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基本规矩，我们的行走就是自由的，我们就会多些风雨里的勇敢、山崩地裂时的坚持。

世间最要紧的事莫过于：让一生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自己的心灵。

■无奇

上海老哥

晚上快八点的时候，春华老哥从门口进来，说自己开车去加油，路过南关厢，想起来要看看我，就来了。

他明天要回上海，因为山东德州的玩友带了蟋蟀过来，如果有中意的蟋蟀，他要买来斗蟋蟀玩。和我说话的时候，他时常向右偏一下头，身子前倾，很努力地听。

“你不要介意，我右边耳朵聋掉了，左边耳朵没有问题，你讲话的时候我有时候听不见，要靠近一点。”他解释道。6年前，他患过脑梗，医好后耳朵就出了问题。他皮肤黝黑，看上去60多岁，或者年龄更大。

他从上海来海宁定居才三四个月，有些人生地不熟，想请我帮忙找一家农家乐，等他斗完蟋蟀，邀请上海的一帮老朋友来玩。“城里的饭店，菜都差不多，没什么好去的，大家主要是想找个空气好环境好的地方吃吃农家菜、聊聊天。他们现在都退休了，闷在大上海没什么意思，我邀请他们一定会过来的。吃好饭，我再带他们来你这里喝茶，大家就是要好玩一些。”他说，上次他不小心掉了包，我帮他想办法找，虽然没有找回来，但是觉得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所以这件事就托付给我来办。

八九天前的晚上，春华老哥带上海的三个朋友来喝咖啡，知道我略懂一点茶叶，就向朋友推荐了我。那是位快50岁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很沉稳，一副老干部模样。他从包里掏出一只泡满绿茶的玻璃口杯，递给我，很客气地说是别人送他的茶叶，自己也不知道好不好，请我帮忙看看。

杯子里几乎被金黄色的茶叶挤满了，叶芽修长，通体金黄，茶汤澄亮。恰好，这茶叶我喝过两次，知道是上好的安吉黄金芽，便脱口说道：“这茶蛮好，是正宗的安吉黄金芽，产量稀少，价格应该在2000块以上，品质再好就要上万了。”

似乎没考住我，与“老干部”同座的男子又拿出一盒绿茶来给我看。

“这是江浙本地人常喝的白茶，一芽两叶，也是不错的茶叶，就是有点淡，不经泡，好茶叶要芽尖细小……”

“我说我这小兄弟懂茶吧，是不是说得挺靠谱。”春华老哥很开心地帮我说话。他说自己口味重，好茶也喝不出什么味道来，家里还有一包好茶，下次带给我尝一下。

春华老哥点了一杯咖啡，只说随便做，只要是我做的都好喝。我知道做咖啡，自己还是只菜鸟，他这样说是为了鼓励我。于是，我做了一杯耗时最少味道苦香的冰美式咖啡，端了上来。

“其实，喝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喝。我这个年纪已经看透了，也是直来直往惯了，不喜欢跟有花花肠子的人说什么。你现在生意怎么样？不要急，也不要怕，刚开始不赚钱是正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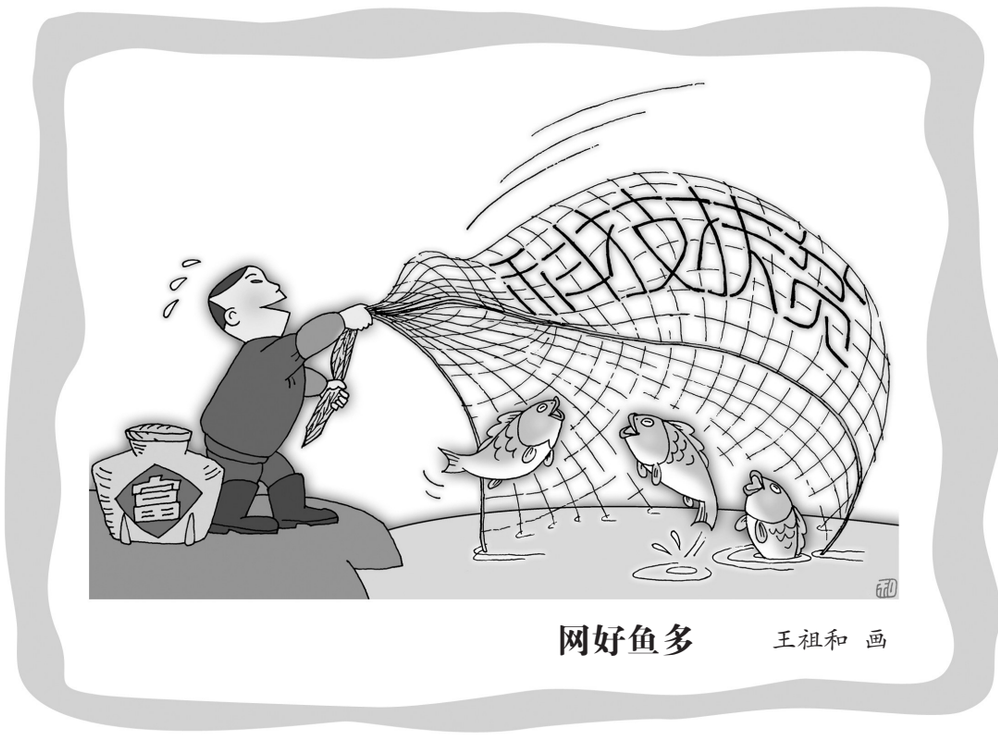
“现在刚刚保本，我也不指望这个小店能赚多少钱，能过得去，有一份打工的收入，时间宽松一点就可以了。”我如实说。

“你这样想最好，钱财虚名都是过眼云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最重要。我上次带来的几个朋友，有一个女的，你可能没有看出来，她得过癌症，差点挺不过来，现在好多了。一场大病让大家都清醒许多，该放下的都放下了，所以现在大家有时间就跑出去玩，上个月我们刚刚跑了趟山东，一周多时间去了好几个地方。现在大家都退休了，有时间，怎么开心怎么来。”春华老哥娓娓道来。

临走，春华老哥摸出一张50元的钞票塞给我，问够了没有。这是两杯的价钱，当然够了，我转身想去找钱，他却一把拉住我：“不用找，这样就行了，你赶紧回去照顾客人。”

“我们之间不用客气，今天出来得急，茶叶忘记带来了，下次一定给你带过来。”说完，春华老哥转身走向了灯火璀璨的街市。我知道，每次结账，他都是多给。

我想，等斗完了蟋蟀，春华老哥会带着自己珍藏的好茶与我共享。他也是个可爱的人，不免让我想起金庸笔下心地善良的老顽童周伯通，以及行侠仗义的丐帮帮主洪七公。



网好鱼多　王祖和 画

■庄月江

一本书，一段温馨的记忆

我的藏书中，朋友赠送的签名本大约有百余册。这些珍贵的签名本，作者签名千姿百态，有的字迹工整秀丽，有的字迹龙飞凤舞，有的钤名章，有的钤闲章，有的临时赠送，未及钤印。还有几本，作者常以笔墨自娱，签名就用毛笔，还写上一些文字，愈加可贵。

藏书中，有一册是手工装订的。这是《北京晚报》总编顾行在ICU病室里签名赠我的《邓拓传》（顾行、成美合著）。

我在北京安贞医院拿到顾行和成美的签名本后，即在他俩签名扉页下方的空白处写上如下文字：“1992年2月27日下午三时，我去安贞医院探望顾行。顾行在ICU，只隔着玻璃窗招手示意。成美引我入休息室，聊天四十余分钟。成美送我此书。她签名后，即去二楼ICU请顾行签名。这书，是十本手工订本之一，作者手里只剩一册了。当时成美告诉我，之所以手工装订十册，是担心重病中的顾行突发意外而成憾事。

1994年12月30日，时任中国晚报协会主席的顾行来信告诉我，《邓拓传》发行后，反映甚好，得了三个奖：山西省优秀图书二等奖、华北十部优秀图书一等奖、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

1998年，解放日报社从50期《文博》版上精选出252篇文章，出了一本《收藏历史》，本人的《孔门遗珍》也有幸选入。文博版编辑陈鹏举和分管副总编金福安寄了一本两人都签名的样书给我，并附信。陈鹏举附信中写道：“签名本当日已发完，如今只能由金福安同志与我签一下，不知合先生意否？”金福安在附信中写道：“鹏举兄《收藏历史》在沪上首发，引起各方极大重视。首发当日三百本一抢而光。许多读者要求增印多售。市委、市政府领导都十分喜爱。报社送了三十五本还是不够，所以又增订了一千本，作为《解放日报》珍品送礼。月江兄是《解放日报》老作者、老朋友，只能寄上一本，且签名本已难办到，请谅。”

然而，我还是得到了一册签名本，是副总编余建华送给我的。他在附信中说：“寄去《收藏历史》一书，系签名本。董释伦告诉我，你来过电话，要签名本。这次我提前托了文艺部的人。此书在我这里已搁了多日，今寄去。”扉页上签名的，除总编秦绍德、分管副总编金福安和编辑陈鹏举外，其他8位都是沪上史学界、书画界名流：刘旦宅、马承源、沈柔坚等年老的或年轻的撰稿人。

金福安说我是“《解放日报》老作者，老朋友”，这话没错。我和《解放日报》的关系很好，得到过老总编陈念云的《报苑耕耘五十秋》、老副总编陈迟的《老紫藤的心事》《少年子弟江湖老》、副总编居欣如的《一得集》《晚霞集》、副总编余建华的《见证改革》，以及华东新闻部主任毛用雄的《蓝色的警告》和编辑第五同的《文海聚沙》。

杭州友人送的签名本更多，大多是新闻、文艺“两栖”作者。《浙江日报》副总编傅通先兼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杭州日报》副刊资深编辑项冰如兼杭州市作协副主席，两位都是写散文的高手。傅通先赠我《天堂游踪》《六艺集》《笑在天堂》《天堂探花》《吟天画地》，项冰如赠我《千岛湖》《西湖月》《月泉心迹》《长街踏月》《斜月秋声》《湖月心影》。从以上罗列的书名可知，傅、项两位，书的内容大多取材于杭州，后者除了杭州，近半内容取材于家乡山村。我很喜欢傅、项两位的散文，不管写世事人情，访名流宿耆，摹山形水态，描花草虫鱼，还是忆亲朋好友，都题材新颖、视角独特、结构严谨、文字清丽，不仅给读者美的享受，还给读者智的启发。这是得益于两位终生搞新闻工作的职业敏感，得益于两位大学四年深造所养成的独立思考。例如，傅通先不足千字的《誉桃》，一反“桃花薄命”与“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的俗见，以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赋予桃花四种品性：“准时开放，极守信用”“花叶同出，相扶相助”“快人快语，说开就开，说落就落”“开花结果两相全”。桃花这四个常人不注意的特点，傅通先不但注意到了，而且还将其人格化了。同样，冰如散文的状物叙景都发之于情、寄托于情，偶有所论，便自然熨贴。《侍王府壁画》中写农民战争的局限，只一句“戎马倥偬之中竟造起如此规模巨大的王府”，看似轻描淡写，实乃笔力千钧，其意无穷，发人深思。

好的散文，景、情、论缺一不可，三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通先和冰如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我喜欢两位的散文，如读田园诗，似看水墨画，吾爱吾园，吾爱吾乡，吾爱吾民，吾爱吾国之情，油然而生。

还有一位钟桂松，由桐乡文化局长、宣传部长、浙江电视台台长，一路升至浙江省广电厅长，公务之余仍然坚持文艺创作。桂松专写故乡人物，仅“丰子恺系列”就送了我《丰子恺的青少年时代》《丰子恺自述》《丰子恺画传》《丰子恺：含着人间情味》《丰子恺与杭州》五部，还有《茅盾书话》《茅盾画传》《沈泽民传》《钱君匋：钟声送尽流光》四部。故乡乡贤名流，一个个都在“小老乡”钟桂松笔下重获新生。

杭州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中，《杭州日报》首任总编李士俊赠我自传《三次追悼》，《浙江日报》总编、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冠西赠我《冠西散文》，《浙江日报》副总编、浙江文联党组书记袁一凡赠我图文并茂的《漫途屐痕》，《浙江日报》总编江坪赠我《文画缘》《我们的圣人》。附带说一说《文画缘》，《文画缘》所收100幅漫画，都出自漫画大家华君武手笔，江坪配“题解”。“题解”短而精，篇篇都是美文。我以《〈文画缘〉，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为题作过评述，认为“一幅出类拔萃的漫画，可以胜过一篇人云亦云的社论”。此外，还有杭州“地下党”时期的《当代晚报》总编、《浙江日报》首任特派记者、20世纪80年代任《联谊报》副总编的张白怀赠的回忆录《双叶集》《摇晃的天目山》等。其中不少作品，我都写了读后感。我想，这不但是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许锋

我的村小

我上小学，是1978年。那是一所村小。真小，没几个班。有教室，是土坯房子。有课桌，是一块长条木板，下面支着四根木棍。木棍有粗有细，有的带皮，皮干面糙，有的光棍，能看见结疤。木棍插入泥土，倒也牢固。有椅子，乃土坯垒叠而已，本色的土，大泥块，没有烧制，也没有刷漆，一人坐两块，高度正好。夏天坐，清凉得很，冬天再坐，凉气扶摇直上，瘆得慌。土坯长年累月被我们坐，被我们磨，两边翘起，中间下陷，凹成小半碗月亮，却越发瓷实、牢固，稳如磐石。

那个村子和附近的村子就这一所小学。夏天好过，夏天却短。冬天里，散居各处的孩子穿得像小熊似的，背着书包，向学校的方向走。遇上大雪漫天飞舞的天儿，寒风刺骨，无孔不入，真要了小熊们的命。雪霁初晴时，小熊们踏雪而歌，调皮地追逐、摇树，树梢的雪花洋洋洒洒，落在脸上、嘴里，瞬间融化。

裹挟一身风雪，孩子们进了教室，各寻各的座儿。学生不少，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一眼望去，都是黑乎乎的小脑袋瓜。蜷缩于各个角落的灰尘，仿佛受到惊吓，一粒粒腾空而起，若有阳光，就看见它们不停地飞旋、漂游、藏匿，尔后，渐渐复归于平静。只是，再稍有大一点的动静，或者，随着孩子们翻阅书本，随着老师脚步的移动，随着朗朗的读书声，尘埃，又间或浮动，在头顶，在鼻翼，在指间，在字里行间，像是贪婪的书虫，吮吸书本弥散、流淌的墨香。

在那间土得掉渣的教室里，老师教我们认字，教我们汉语拼音。偶尔，我也走神，也发呆。窗外飞过一只小鸟，瞬间能转移我的注意力。老师走到我的身边，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的脸一下子发烫，我本来就是黑脸蛋，那会儿肯定黑里透红，难看得要命。

在老师的教育下，我们知道了花鸟鱼虫正儿八经的名字，知道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回家吃饭，米粒掉在桌上，捡起来吃，不嫌脏。

后来，我也当了老师。我教的是大学生。

每次走进阶梯教室，我都要拾级而上。拾级而上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村小。想起村小，我就会忆苦思甜。有的学生很惊讶，从他们看我的眼神，我知道，他们当我是天外来客。有的半信半疑，可能觉得我在编谎。他们坐的是木椅子，夏天不热，冬天不凉。木书桌，一字排开，夸张一点说，光可鉴人。窗外，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南方夏日长，三四月，天稍热，开电风扇。五六月，燠热天，开空调。即便到了秋末冬初，北方已经飞雪，南方依旧艳阳高照，一进教室，同学们嚷嚷热，马上去开风扇，风搅动空气，草木扶疏的窗外，草香、花香盈盈袅袅而来，满教室里游弋。

生活，真美。

我看到了当年的我。有的学生爱玩游戏，玩得很投入。我悄悄走向他的时候，他本来是不知道的，但是，却察觉了。他旁边坐着的男生用胳膊肘杵了他一下，他迅速抬起头，把手机塞进抽屉，动作连贯，几近完美。再重复这个动作——他抬起头的同时把手伸进抽屉再缩回手，然后若无其事。他想若无其事地看着我，但眼神是慌乱的。我笑眯眯地看着他，他的目光有点躲闪，接着，嘴角一咧，羞涩地笑了，脸也红，白里透红，比我当年好看。

有的学生玩的是大游戏。游戏的开发者绞尽脑汁地设计了一道道关卡，每一道关卡都充满凶险，要斗智斗勇，闯关并不容易，中途退出，等于前功尽弃。我不管他玩得容易不容易，兴奋不兴奋，成功不成功，只是笑眯眯地望着他，挑一挑眉头。他知道我的意思，有些惋惜和不舍，但只能忍痛割爱——抓出手机，关了屏幕。

这个时候，我会再次插播40年前的我的童年片段。我讲一桌、一椅。桌是没有刨光的桌，椅是土块垒成的椅。桌上的毛刺，有时候会扎进肉里，不及时挑出，手会肿胀发炎。椅子黑，长年累月浸染，孩子们的屁股蛋子也黑。孩子们走在路上，从背后看，屁股上挂着两个圆坨坨。

大部分学生并不厌烦，能听得进去。我知道，当一个学生还能意识到错误的时候，还会羞涩的时候，两腮还能浮起红晕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还非常善良和单纯。他们就是贪玩。无非，我们小时候玩的是滚铁环、踢毽子、打陀螺、捉小鸡，他们从小玩的是电脑、手机，看的是动漫、大片……老师，便是他们的引路人——小学老师，引小学生的路；中学老师，引中学生的路；大学老师，引大学生的路。

始于课堂。一桌，一椅。桌子变了，椅子变了。师生间的温暖，却如一缕阳光，40年不变，亘古不变。

协作：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　杭州滨江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鑫伟低碳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杭州中港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